

民间经济是 21 世纪中国 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对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的比较分析

王永祥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不同的经济区域从各自的特点出发，先后探索并创立了许多不同的地区经济发展方式。对于这些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方式，人们习惯地称之为“××模式”。在我国 20 多年的改革实践中，这样模式有许多，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和珠江模式等。这几种模式代表了我国在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过程中某一发展阶段上的重大成果。同时，由于这几种模式在产权结构、运作机制、发展动力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别，因此，从这几种模式诞生之初，理论界及其他各方面就一直存在着谁更能代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争论。

不可否认，无论是温州模式，还是苏南模式或珠江模式，都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劳动者的伟大创造，都是改革过程中的制度创新。但是，几种模式的内涵，创新的条件及外在环境方面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第一，这几种模式虽然都是制度创新，但却分属不同的创新类型。按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按照创新主体选择的不同，创新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种是体制内供给型强制性制度变迁；另一种是体制外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比较来看，苏南模式属于前一种类型，而温州模式则属于第二种类型。至于珠江模式，则带有两种类型混合的特点，很难把它归结到某一类型之中。

第二，由于分属不同的制度创新类型，因此，这三种模式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异。苏南模式主要不是由初级主体发动，而是由次级主体来发动的，是在地方（社区）政府的强力干预和引导下，自上而下地进行的制度变革。温州模式则完全相反，主要是初级主体发动并带动次级主体自下而上进行的一种体制外的制度变革。而珠江模式仍带有上述两种模式共同的特点。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苏南模式诞生之初对传统体制的冲击

并不大，基本是一种体制内的搞活。它的萌芽在传统体制内部就可以萌发，在以后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它不但没有受到传统体制或来自政治方面的压制，反而会受到传统体制或来自政治方面的保护和一定程度的支持。而温州模式就完全不同了，它从一开始就是对传统体制的一种“背叛”和抛弃，在价值取向，产权制度，资源配置等方面，与传统体制都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它不能在传统体制内部自发生成，更得不到传统体制的支持，而只能发芽于传统体制之外，主要由改革的初级主体来发动与推进，并通过在与传统体制的抗争和较量中，来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壮大。这一点，我们从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所走过的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另外，从经济增长的动力来看。苏南模式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政府（社区），属于由次级主体（政府）发动型，温州模式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微观经济主体（初级主体），属于私人发动型。而珠江模式则是两都兼而有之。从资金筹集的途径看，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相似，都具有内生型的特征，主要来自内部积累，而珠江模式则倾向于引进外资型，从外部获得的资金积累比重比较大。

第三，三种模式之间差异，主要是由外在的环境和条件的差异造成的。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改革的过程也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当人们开始选择之时，其所处的外在环境和条件，就成为确定不同的选择方式的重要依据，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在这方面，苏南地区，珠江地区与温州的差别是很大的，苏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历来就是中国的首富地区之一，集体经济实力雄厚，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经济发展的起点比较高，再加上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更是全国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苏南地区地处上海、南京等中国最发达的工业走廊的边缘，处于上海的智力和技术技能资源的强辐射区内，沾尽了上海“星期六工程师”的光，可以快捷地获得产业和技术延伸的好处，相对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再加上地方

政府的强力干预及提供信用担保等支持措施,用不着在制度改革方面动大手术,很快就发展起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在改革之初,就进行较为彻底的产权变革,成本也太大,也缺乏使改革继续推进的土壤和条件。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腾飞,则与其毗邻港澳密切相关,仅1980~1993年,广东的顺德、南海、中山、东莞等地就吸收港澳资金达20亿美元之多。一举解决了经济发展中的资本原始积累问题。正是因为拥有这样优越的外部条件,两地无需进行较为彻底的产权变革,就可以很容易地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所以,一些经济学者称苏南模式为“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农村问题权威杜润生更是直截了当地称其为“小全民”。相比之下,过去一直被作为海防前线的温州,一无国家投资,二无集体家底。再加上地处偏远,远离大中城市,连弱辐射也沾不到。但是,这种外在条件却使在温州地区进行较为彻底的变革所付出的成本非常小,而所能带来的预期收益则比较大,所以,温州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以较为彻底的改革来促进经济发展之路。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大力发展私人经济,并通过市场来重新配置资源,同时,异常能吃苦的温州人以家庭作坊和小商品专业市场的方式来发展非农产业,以离土不离乡的家庭工业和离土又离乡的自产自销方式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来推动经济发展。这是改革过程中的另一路径选择。待温州的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时,有关“温州模式”之说也就不胫而走了。但时至今日,什么是“温州模式”仍然没有统一的说法,学者们的归纳也不一。经济学家钟朋荣把温州模式归纳为“六个家家户户”,家家户户开发项目,家家户户研究管理,家家户户融通资金,家家户户开拓市场,家家户户承担风险,结果家家户户都有企业家。而杜润生先生则给出了一个实质性的概括:民办,民有,民营,民享。

二

在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说法公开以后,在我国的经济理论界就一直存在着对两种模式的比较。这种比较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两种模式也来了个很有意思的“命运对换”。前一个时期是扬苏抑温,苏南模式由于在短期就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成效显著,因而备受瞩目,更因为它符合共同富裕的目标,因此,被一些人认为是中国新农村工业化的成功代表。而温州模式则有点“坏小孩”的形象,还因其改革过程的无序化和一段时间内假冒伪劣严重而有点臭不可闻,不时会受到来自政治方面的批评。90年代以后,风向为之一变。以个体和私营为主的温州经济因其产权制度变革的彻底和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经济潜力逐渐发挥出来,而以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经济的发展却逐步放慢。温州模式开始走红,而苏南模式似乎已走到了尽头。就连一些过去热情宣扬过

苏南模式的学者也不愿意再提这个话题。这种情形自党的十五大以后,变得更加明显。笔者认为,这种变化是正常的,但无论是扬苏抑温,还是扬温抑苏,都有其片面性,也都失之公允。

首先,无论是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都是过去20年改革中我国民间经济发展的两个成功的范例,如前文所说,是依据当时当地的客观条件自发选择的结果,苏南和温州分别以集体和个体为基础,都较快地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时至今日,两地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较快和财富积累最成功的地区。

其次,实事求是地说,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之间的命运对换,也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世界上没有一种经济模式是十全十美的,总是有其长也有其短。比较来看,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产权制度变革的彻底性和资源配置市场化程度上的差异。苏南模式以集体为主,乡镇企业和地方政府合起来是改革的发动者,而集体经济即使在传统体制时期也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以发展集体经济为主来推动经济增长,既符合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走共同富裕之路)也很容易得到政治方面的认同。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这样的改革更多地带有改良的色彩。它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其成长之路也比较顺畅,但基本上是在传统体制时期受到压制的经济潜力的释放。待这些潜力释放完毕,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加深之后,其内部的一些弊病(如对行政力量依赖过深,政府干预过多等)也逐渐暴露出来,并制约和影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温州模式则以个体和私营经济为主,从一开始就走市场化之路,由于私营经济相对于国有经济以及集体经济是一个“另类”,这样,在改革初期,在人们对改革目标的认识还不明确之时,这种另起炉灶的做法,其成长之路也必然是不平坦的。但是,随着人们观念的不断更新,特别是改革目标模式的认识上更加明确以后,温州模式以其清晰的产权结构,运作的高度市场取向,得到各界的一致认同也就是必然的了。从这一点来看,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的命运对换其在理论上的真实意义,在于它反映了一个对私营经济从非议、认识到认同的过程,反映了这样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在未来的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中,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民间经济,将是真正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力量之一。

第三,任何模式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也就温州模式的形成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温州经济中产权结构不断发生演变,从家庭经营发展到股份合作制、股份制,经营方式也从单纯地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方式,向资产经营、资本经营的综合发展之路。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已走上了集团化的发展之路。根据这一变化,有些经济学家提

出了“新温州模式”的观点（见《温州侨乡报》2001年5月12日报道）。这种自我调整，自中国加入WTO以后，步伐明显加快。这说明适应中国人世以后的新情况，温州模式已进入了一个嬗变期。

这一变化在苏南模式中来的更早。对苏南模式的反思早在90年代初就开始了，并在90年代中期初步形成了一致的意见。1992年6月8日，《新华日报》刊登了浦文昌的文章《对“苏南模式”的反思》，文章指出了苏南模式在五个方面存在不足：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缓慢；破除平均主义见效不大；市场机制发育滞后；城市企业和经济活力不强；科技进步及人才意识淡薄等。而江苏省委党校储东涛教授则通过统计数字的对比，说明苏南经济增长已被一些省市超过，并指出这一放慢的原因是苏南模式的“自身机制退化”。到了90年代中期，这一观点已被更多的经济学家所接受：苏南地区在原有的体制空间里已达到了该模式的本质特征所规定的发展极限。

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引导下，苏南模式开始了其发展进程中的第二次“蜕变”，进行第二次改制。

两种模式都在发生悄悄的变化，变化的核心问题也相同，都是进一步深化产权制度变革。温州模式的变化是对个体私有制的一种“扬弃”，走向社会化，公司制。而苏南模式的变革是产权制度的进一步清晰化。尽管在这一变革过程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可以肯定的是，经过再次变革以后，无论是温州，还是苏南，其经济发展方式将会更加符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也会给经济发展以新的强有力的推动。

参考文献

胡宏伟、吴晓波：《温州悬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奔向新世纪》（温州市跨世纪发展战略研究文集），温州市人民政府资料。

作者单位：温州师范学院政治经济系
（责任编辑：李 零）